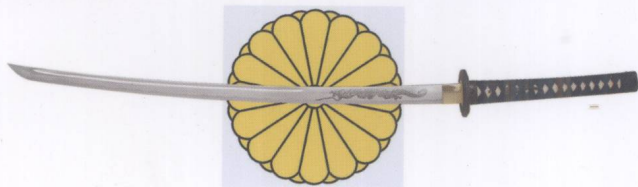


认知日本系列
日本と日本人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 / 著
魏大海 郑礼琼 / 译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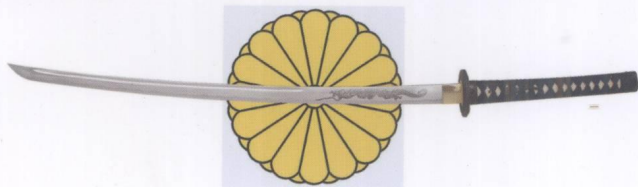
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黷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



青岛出版社

认知日本系列
日本と日本人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 / 著
魏大海 郑礼琼 / 译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黷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



青岛出版社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日本人恒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他人尊敬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实现这个目的使用的手段，则依情况的不同而取舍。事态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走上新的道路。这也是日本对于美国占领军夹道欢迎、未曾发生过一次复仇行为的原因所在。

日本人在属于妻子的领域和性享乐的区域间设置了一道藩篱，明确地区分开来。两个领域同样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两者的区别在于，一方乃属人的主要义务世界，另一方则属改换心情的消闲世界，如此划定了各自领域的“恰当位置”。这种习惯，可将两个领域看做各不相同的世界——家庭中的模范父亲或市井中的花柳之徒。

ISBN 978-7-5436-5560-7



9 787543 6556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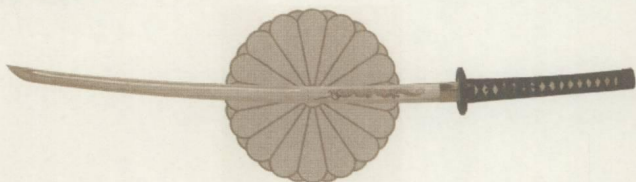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36-5560-7
定价: 35.00元

G131.32

5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 / 著
魏大海 郑礼琼 / 译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黷武却又同时具有耻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 (美) 本尼迪克特著；魏大海，郑礼琼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 9

ISBN 978-7-5436-5560-7

I. 菊… II. ①本…②魏…③郑…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G131.32 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5757号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著 者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
译 者	魏大海 郑礼琼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266071)
邮购电话	0532 - 80998664 13335059110
传 真	0532 - 85814750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总 策 划	孟鸣飞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插 图	魏大海 肖淑荣
封面设计	毛 增 QQ: 506243214
内文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申 尧
排版制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10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20 mm × 1020 mm)
印 张	20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5560-7
定 价	35.00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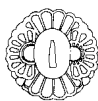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80998826)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文化

《菊与刀》的著者，是美国的女性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48年病逝）。1909年，本尼迪克特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赴欧洲游学一年，生活于瑞士、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的平民家庭，充满好奇地观察、体验了不同国家的日常风俗。这些体验成为其日后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最初铺垫。当时，人类学还不是一个世所公认的专业。回国后的数年间，她在加利福尼亚州一所女子学校教授英语。此间她对加利福尼亚数万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的移民生活发生兴趣。1914年回到纽约之后，与生物学家斯坦莱·R.本尼迪克特博士（1936年去世）结婚。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学者性格中具有某种诗人气质或天赋，丰富的诗人想象力是她有别于其他“科学性”人类学家的一个特质。此外，据说她一开始便无法满足于异民族生活的外在性观察或基于自我主观性观察的片面解释，她总是通过观察对象，努力把握行为的内在意义。

1919年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博厄斯教授开始了她的人类学研究。毋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她接触人类学的直接契机。她是一位人道主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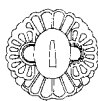
义者，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她坚信国际间的摩擦与争斗源自民族间相互的理解缺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更加深化了这种认识——认为人类学研究正是打开那扇民族封闭之窗的钥匙。她相信人类学研究正是建立在国际间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她尤为擅长的领域是原始宗教、神话与传说的研究，最为著名的学术贡献在于所谓“文化类型”学说（cultural pattern）的确立。其相关概念关联于行为心理学。她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内含着若干“模型”，或者说这些“模型”构成了综合有机的整体。这种“模型”为种种行为赋予意义，它是包容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某种媒介。如上概念，包含在她1934年代表性论著《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中。而《菊与刀》（1946年出版）则是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性论著。众所周知，读者大众的共识乃是，该著最初是受美国战时情报机构之托（1944年）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书，目的在于解说美国的日本占领政策或为美国制定新的占领政策提供参照。该著1946年公开出版后，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应。1948年日译本出版，成为日本国内最为畅销的图书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武汉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部日本学者森贞彦撰写的《〈菊与刀〉新探》。森贞彦在该书中文版出版前言中写道：“《菊与刀》的出版过去了60多年，其间涌现出大量有关日本的文化论或有关日本人的新的论著。随着它们的问世，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只是过分关注那些新的论说，《菊与刀》似乎成为陈旧的东西而被束之高阁。然而依己之一孔之见，这些所谓的新著没有一部能够超越本尼迪克特的学说。”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旁证了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学术价值或恒久生命力。而森贞彦的另一说法同样发人深省。他说：“……将《菊与刀》误认作一部研究报告书者大有人在。实际上，1944年夏天开始编写的这部研究报告书，直至1946年秋天即战争结束经过了一年多之后才发表，那确实是有其原因的。某些人为了确立或突出前面提到的研究目的，居然连这一基本实情都没有觉察到。这种轻率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个提示表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并非目的单一的、实用性的研究报告书，而

是一部真正的人类学学术专著。森贞彦同时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基亚兹的专著《文化的解读方法／书写方法》（森川弘次译，岩波书店1996年版）中一段有趣的描述。写到美国人读完了《菊与刀》时，他们的最终结论是：“日本是自己战胜过的对手中最捉摸不定的国家。”森贞彦断言，美国人读后居然产生此等感想的作品，在1946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得以出版，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他还强调说，《菊与刀》的作者同时明确地告诉读者：“应该看到，日本也是我们所战胜的国家中最通情达理的民族。遗憾的是，迄今尚无人论及这一点。”《菊与刀》堪称一部蕴涵着高深的思想哲理且又妙趣横生的著作。森贞彦在其论著的结尾也说，当然，本尼迪克特也不是神仙般的人物，她也难免会有失策之时。比方说在《菊与刀》的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中论及，1905年日军攻陷了旅顺要塞后，乃木大将与俄方败军首领斯托塞尔间曾有一段绅士般的交往佳话。本尼迪克特将此归因于，近代以来的俄国人“从未羞辱过日本人”。森贞彦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尼迪克特的说法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我们还发现，在九州出版社的汉译本书末，附译了日本学者川岛武宜的论作《评价与批判》（刊于1945年5月日本《民族学研究》杂志）。这篇论作中的许多说法值得注意。作为日本学者，川岛对露丝·本尼迪克特论著中的某些结论提出异议。他说，露丝·本尼迪克特没有到过日本，没有详细接触过所谓“义理”的种种表现，更没有直接体验过使用“义理”一词时的种种现实性背景或场景，因此她关于日本人“义理”的论述与事实不符。川岛同时表示，露丝的错误可以理解，因为在那种特定的时间、场合下，《菊与刀》毕竟相对准确地把握了日本文化许多方面的真切本质。

值得一提的尚有清华大学历史学者刘晓峰2006年5月26日刊于《环球时报》（第20版）的著文。文章评价说，在众多论及日本民族性的著述中，成书于1946年的《菊与刀》可谓其中的抗鼎之作。他强调《菊与刀》1948年翻译成日文后，曾一举卖出230万册，他说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记录。更具意味的是，近两年《菊与刀》在中国也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持续好销。他说自己最初知道有《菊与刀》这本书，还是在读了金克木的一篇介绍性文章之后。后来，他则先后看过两个不同的译本。他说当时无论如何没想到，商务印书馆16年前出版的这本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著作，2005年竟先后重印了7万册，并意外登上了商务印书馆畅销书排行榜。2006年以后，该书的销售情况依旧很好。当然《菊与刀》的畅销也引起日本媒体的高度注意。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等都对此做过专题报道。日本记者分析说，本书2005年畅销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时值抗战胜利60周年，同时因为，当时的中日关系陷入了特殊的僵局。很多人垂青此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思考日中关系。刘晓峰的这些说法颇具说服力。他同时表示，作为研究日本历史的中国学者，听到此类消息心中却有几分沉重。二战结束已半个多世纪，中国的读者了解日本，依靠的竟然还是60年前美国人撰写的《菊与刀》。他说至少在这一层面上，说明我们的日本研究尚有很大的欠缺。说到《菊与刀》经久不衰的原因，刘晓峰指出，长期从事人类学工作的本尼迪克特对于研究对象采取的相对客观的理解性立场，帮助她相对成功地分析、解剖了日本文化。本尼迪克特注重的是资料中最为重要的细节，并利用这些细节描摹出一个相对鲜活的日本——“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也许有读者感觉奇怪，为何将两部名著（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合辑一集？有趣的是，台湾线装书局也曾出版了一套有关日本的图书——《日本四书》。其中同样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1946年）、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1899年）、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年）和蒋百里的《日本人》（1937年）。线装书局将如上四种名著崑为一册，作为当今读者了解日本必读的文本参考。

新渡户稻造（1862~1933），也被称做20世纪初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学家和国际政治活动家之一。他是一个基督教信徒，早年毕业于札幌农学校，曾先后赴美国、德国留学。回国后，他在多所大学任教，1918年任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武士道》是他最著名的一部论著，他也因此成为日本精神界或伦理学界的一个权威。1984年发行的日本银行券 5000日元上即印有其肖像。1899年著者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州养病，有感于洋人对日本的传统武士道知之甚少，便以英文写成此著以向国外介绍相关知识。作者幼年时代，接受过武士道的传统教育，正因如此，著者说他在介绍日本的相关文化现象时，便与其他外国的日本研究者不同——后者顶多是个“辩护律师”罢了。而著者的目的，是向国外读者介绍“武士道”，行文中比较性地大量引用了西方的历史和文学典故。这种方式显然有利于外国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因此本著出版后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著者在其自序中说，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自己阅读此著，还以此著分别馈赠其友好。本著的日文版从1900年到1905年的6年间，重版了10次之多，还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的日本研究书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长期以来“武士道”一语在中国读者心中强烈的负面形象。但是通过阅读《武士道》这样的文化学论著，读者显然会明晓这一文化概念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绝非我们原先理解的那么单一。特定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历史发展中演化形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残忍或凶暴。此外，我们知道，《武士道》最初期待面向的读者群体是西洋人，且论著的写作、刊出时间是在一百多年以前，因此，如今或有事过境迁之感，但即便如此，这种文化现象毕竟是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且特征显著的一个传统性意符，因而有必要对之做出更多更细致的了解，从而更加准确地了解、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

这也正是我们推出这套“认知日本”系列文化丛书的初衷。本丛书最初由青岛出版社社长孟鸣飞先生于2005年策划，后因中日关系出现障碍而搁浅，如今显然有重新启动之必要。首先奉献的是两部合辑为一的重要译著，之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文化名著。

魏大海

2009年6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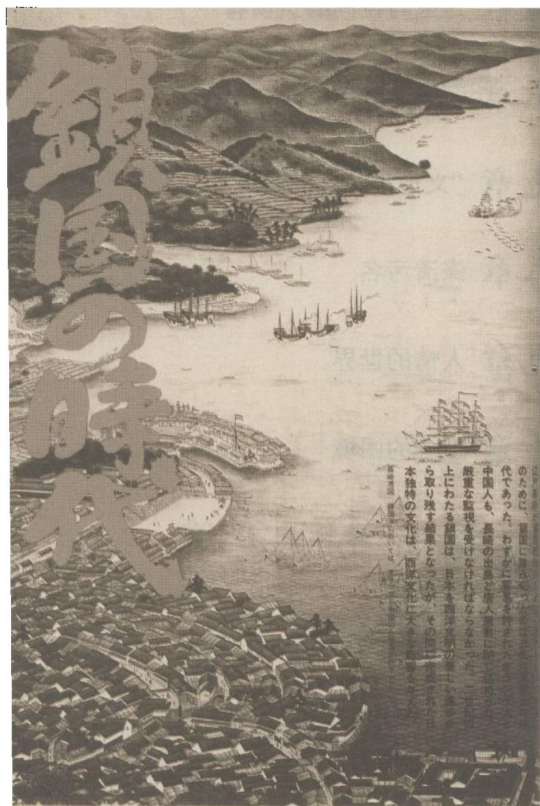
目录

004	译者前言
012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028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047	第三章 “各得其所”
073	第四章 明治维新
090	第五章 过去与世间的负债者
103	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返恩
119	第七章 “义理是最大的负累”
128	第八章 涤清污名
153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167	第十章 道德的困境
192	第十一章 修 养
210	第十二章 孩子的学习
240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55	附《武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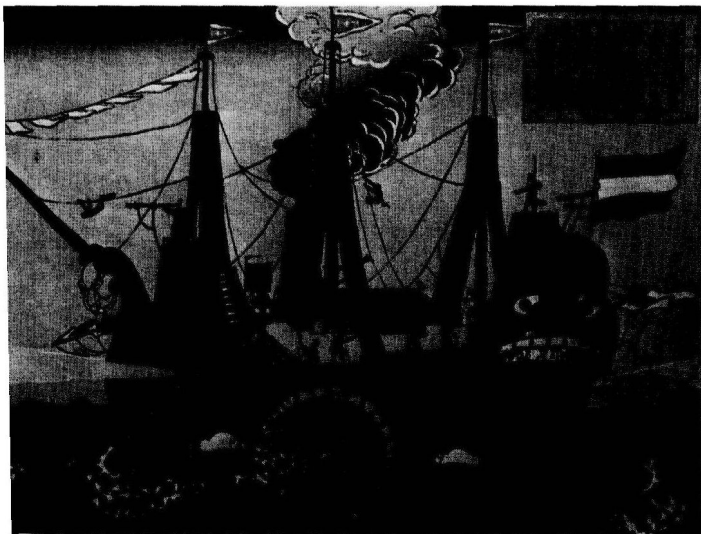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

在美国举国一战的敌国中，日本人的心性尤难把握。在与这个强大对手进行的战争中，我们发现其行为或思维习惯竟与我们有着巨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认识日本。这种状况是我们不曾经历过的。我们与之前（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沙俄帝国一样，面对着一个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的、武装到牙齿而又训练有素的国家或民族。西方国家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在日本人眼中显然是不存在的。这就使太平洋战争的特点不仅局限于一系列岛屿的登陆作战，也不仅局限于艰难的军队运输、军营建设或给养补充之类的后勤问题，此时，了解敌方的



日本锁国时代



黑船与佩利像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率舰队来到浦贺，向幕府递交了美国总统亲笔书信，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翌年再抵江户湾，在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从此日本被迫开放门户。

性情竟成为主要的矛盾。与这样的敌人对抗，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

困难是巨大的。在日本脱离了锁国政策^①、打开门户的75年里，有关日本人的著述总将日本人描绘得扑朔迷离——频频出现“但是，却又……”之类的矛盾句式。而在描述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民族时，这样的状况十分罕见。严肃的观察家在论及其他国家的国民时，一般不会在夸奖其世所罕见的彬彬有礼时，又厌弃他们的傲慢无礼或妄自尊大；不会在鄙夷其因循守旧的同时，又说他们对所有的新奇事物趋之若鹜；不会在称赞他们民族性格的温顺谦和时，又指责他们常常不服上级的管制；不会一方面说他们宽厚而忠实，另一方面又认定他们是居心叵测、怨天尤人的类别；不会说他们勇敢阳刚又怯懦如鼠；不会说他们时刻顾及他人的评价却又并不具有真正的良心；或军队中机器人一般的训练与士兵的不服管教乃至犯上作乱的强烈对立。这个民族热衷于西洋文化，又是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不妨说，此般描述宛若两

①1636年至1854年，美国迫使日本幕府签定《日美亲善条约》的两百多年，是日本历史上的锁国时代。德川幕府颁布锁国令，禁止基督教传入日本，并切断西南诸藩与外国的贸易。



菊与刀 日本文化的类型



1856年位于下田的美国驻日领事馆。左图肖像为最初
的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

部该民族的研究著述：一部描述了爱美的国民共性——对演员和艺术家推崇备至且醉心于菊花栽培的秘诀；另一部则令人惊异地补充说明了该民族崇尚刀剑或无上荣誉归于武士的别样事实。

总之如上矛盾，构成了相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错的经纬。那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刀与菊，共为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懦，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他们十分介意外界关于于己的看法，但在劣迹无人知晓时，则又在罪恶的诱惑下随波逐流。日本的军队受过彻底的良好训练，却又同时具有反抗性。

了解日本已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不能对前述矛盾及其他诸多类似的显著矛盾置之不理。严重的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令之投降？是否应轰炸皇宫？对日军俘虏我们可持何等期待？继而，在对日本军队或日本

本土进行宣传时，怎样的表述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且削弱日本人顽抗至最后一人的意志？这些问题，在美国的日本通中也严重得意见相左。当和平降临的时候，日本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国民呢？难道维持秩序，便须没完没了地发布戒严令吗？美军是否要做好准备，与日本深山老林或要塞中负隅顽抗的狂热的日本人战斗到底呢？在世界和平或将到来之前，日本是否有必要发生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来领导这场革命呢？或者，等待日本民族的唯有毁灭？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受托从事日本研究工作——使用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辨明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是年夏初，美国对日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而大规模的反攻刚刚开始。在美国，许多人认为对日战争还将延续三年、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日本，有人则说此次战争或将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已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然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以后，形势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无必要，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美军已登陆塞班岛。这一大战役预告了日军的终将失败。此后，美军官兵与日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战斗。而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达拉瓦和比亚克等处的战役中，我们已对眼前的这个可怕敌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1944年6月，我们急需解开敌国日本的诸多疑团。无论军事上还是外交上，无论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日军前线的攻心战宣传品，所有方面皆须明察秋毫。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中，我们必须了解的，不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的漫长历史，也不仅是经济、军事上的统计资料；我们亦须明白，日本政府期望从他们的人民那里获得怎样的支持。我们必须努力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廓清形成于这些习惯的特定模式。我们还必须搞清楚，在那些行动、意志的背后具有怎样的强制力。我们必须暂时搁置我们美国人采取行动时的诸般前提，必须避免轻率地得出结论——以我们自己的行



为方式比同于特定情况下日本人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

我所接受的是一个困难的课题。美国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战争中容易把一切恶名归于敌国，作为敌人要想了解敌人心中关于人生的看法，实是难上加难。但这个任务必须完成。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自己同样境况下的行动方式。我们必须将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作为理解他们的“正值”要素而非“负值”要素。我首先考察了日本人战争中的行为方式，不是作为军事问题而是作为文化问题来看待。与平时一样，日本人战时的行为方式也充满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那么，在他们关于战争的行为方式中，是如何表现他们生活方式或思维方式特征的呢？日本的统治者激起了国民的战争狂热，安抚着国民的精神惶恐，且在战场上调兵遣将——这些方式显示了日本国民可资利用的种种优势。为了准确观察日本人战争中一步步展现自我的方式，我们必须认真考察战争中的每个细节。

但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对我显然是不利的。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实地调查却是文化人类学者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且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活动，进而做出重要与否的区分。我无法观察他们做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也无法观察他们关于后代的养育方式。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所著《须惠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那是人类学家关于日本村落的唯一的实地性考察。但1944年我们面对的有关日本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研究中尚未引起重视。

尽管有上述种种巨大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却相信仍有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至少我还有机会，以文化人类学者倚重的方法——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直接地接触。在我们的国家，成长于日本的日本人为数不少。我可以由他们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大量具体的事实，由此发现他们的事物判断方式，根据他们的陈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对于我这样的人类学者而言，这种方法对于理解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利用图书馆的历史事件剖析资料或统计文献，追踪文字记述、口头相传或日本宣传词句中显现的变化。我确信，那些